

中国古典诗歌选注

林家英

陈志明

选注

中国古典诗歌选注

林家英 陈志明 选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419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1084194

中国古典诗歌选注

(二)

林家英 陈志明选注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75 插页2 字数520,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

书号：10096·339 定价：3.80元

前 言

中国古典诗歌经过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众多诗人的创作实践，无论题材的开拓，艺术表现手法的提高，音律、形式美的探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诗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汲取丰富的素材，又有前代文学遗产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诗歌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荣局面。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收录了二千三百余家诗人近五万首作品。这个数字虽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唐诗空前繁荣的盛况，但在数量上也已经超过唐以前所有诗歌的总和。近代以来还有人逐步在作增补辑佚的工作，对诗人和作品都陆续有新的发现。近人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先生的《全唐诗续补遗》等著作，已由中华书局汇为一书，命名为《全唐诗外编》，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发行。可见唐代诗歌的作者和数量真是洋洋大观，令人惊叹。唐诗的空前繁荣，不但表现在诗人辈出，作品数量多，还表现在内容的丰富、风格的多样、技巧的成熟、流派的形成、思潮的演进、名篇传诵之广泛以及五、七言古体、律、绝形式齐备等方面，无不超越前代，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这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群星丽天，巨星照耀，唐代诗国的天宇，为祖国光辉灿烂

的历史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南下灭陈而统一中国，建立隋朝，表示着汉末以来近四百年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结束。隋文帝末年，国力日渐上升，人口激增，府库充盈。但是，在丰厚物质财富基础上即位的隋炀帝，荒淫残暴，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其黑暗统治，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短命的隋王朝也就在农民革命的烈火中焚灭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在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帮助下，征服群雄，于公元六一八年在长安称帝（唐高祖），建立了唐朝。九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文治武功，悉心经营，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在此后将近一百年中，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国力空前强盛，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最强大的大一统帝国。

唐太宗是一位善于以古为鉴、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人心向背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如继续实行隋的均田制，和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租庸调赋税制度，对吸收流亡劳动力回到土地上来起了很大作用。从高祖到唐玄宗时，对水利事业比较重视。封建政府在工部机构内，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又有都水监和都水使者，掌河渠修理和灌溉诸事，并不断兴修水利。如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唐会要》卷八十九）玄宗开元时，“在太原开有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和千亩渠等，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新

唐书·地理志》)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不但为农业增产提供了保证,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唐帝国不断繁荣强盛。据有关史籍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西京东都米斛(十斗)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通鉴》)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全国共达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千八百八口,比武德年间二百余万户增加了四倍多。唐代以长安为中心,与各州县之间均有通道。沿着各条大道,驿站棋布。兵部下的驾部,掌管全国驿站,共计有驿站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二所水陆相兼。(《唐六典》)经济繁荣,人口激增,交通发达,为封建文化教育的发展,开阔人们的眼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与发展经济的政策相适应,唐太宗在政治上的革新精神,在历史上也是享有盛名的。他任用贤相,注重吏治,善于纳谏,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实行开明政治。到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2—741年),继续任用贤相,励精图治。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刑部奏天下死罪仅二十四名。以上各项数字反映出唐王朝政治巩固和物质财富充实的情况。伟大诗人杜甫晚年无限怀念开元时代的盛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之二)这种盛况,是人民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辛勤劳动的伟大成果。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虽然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明朗化,但从表面来看,整个社会仍是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唐代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中华民族的创造伟力,在各个领域中发扬光大。唐诗

也就在这个上升发展、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初唐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一般中小地主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日益强烈。唐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实行科举制度来选取官吏，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当时科举考试以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诗赋试策是进士科考试的主要课题。贞观（公元627—649年）以后，大臣多从进士科出身。于是，诗歌创作就成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文士学诗的风气日盛。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大都经历过一番刻苦的创作实践磨炼，才通过科举或荐举登上政治舞台。由于他们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眼界比较开阔，对社会民生有所体验了解，能予以关注，且怀抱济世理想，因而往往能够大胆地反映人民的某些要求，勇于议论时政，抨击弊端，向恶势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这种积极用世、面向现实的精神，在开元以前政治比较开明的环境中，得到鼓励。开元以后，政治逐渐黑暗，动乱的危机四伏，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不过，唐代后期的统治者，基本上没有对诗歌创作下过禁令，设置禁区。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和唐代最高统治者自身对诗歌的爱好、提倡有关，同时也是唐初以来对思想文化采取开放政策的结果。自贞观以来，儒、道、释三家并盛，允许自由讨论，而不是独尊一家。象韩愈因反对迎佛骨而遭贬的例子，是个别的。思想界的活跃，对唐代诗人思想解放，积极开拓新题材和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方法，无疑是有利的。杜甫《丽人行》，批判锋芒直指丞相杨国忠及杨氏姊妹的荒淫；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点名指责哥舒翰穷兵黩武；白居易的讽谕诗从各个方面揭露，抨击了上层官僚社会；杜牧《过华清宫》、李商隐《马嵬》等诗，公开议论唐玄宗和杨贵妃生前的荒淫和无可奈何的悲剧结局，都没有

遭到指责和迫害。不象魏晋之交时期司马氏集团残酷屠杀异己，知识分子多被杀害，也不象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不但以文字罪人，而且每多株连。唐诗的健康发展，是离不开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的。

唐初以来，随着对外发展和国际海陆交通的畅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一方面是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远播于东亚各国以至欧洲；另一方面是外国和西域各民族乐舞的输入。如当时风靡朝野的西域乐舞，不但使人们耳目一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也唐代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岑参七言歌行富于变化的旋律，刚健昂扬的情调，和他两度出塞，接受西域乐舞影响不无关系。被时人并称、赞誉为“三绝”的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舞，其飞动流走的节奏，豪放不羁的气势，痛快淋漓的抒情，无不激荡着一种刚健明快的音乐性的美。唐代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十部，除燕乐是唐人创作，清商是前代的旧作外，其余八部均是外来音乐。它们各有特色，风格迥异。如西凉乐舞宜于表演节奏徐缓、情调优雅、气氛和谐的抒情乐舞，而龟兹乐舞则以刚健、急促的旋律，欢快热烈的情调见长。这些乐舞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有利于唐诗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唐诗的繁荣，除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即外因的促进外，还由于诗歌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即内因所决定。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从先秦《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开始，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两汉乐府民歌、建安诗歌、两晋以来咏怀诗、咏史诗、田园、山水诗以及南北朝乐府民歌，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展了这两大传统。从诗歌形式来看，无论《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还是《楚

辞》衬有“兮”字、长短不齐的句式,它们都是适应各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后代诗歌的形式必然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两汉乐府民歌以五言为主的格式,受到人民的喜爱,广被运用,到汉末古诗十九首,逐步趋于成熟。魏晋时代,文人纷纷运用五言的形式创作,巩固并发展了五言诗在诗坛的地位。南朝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声律说”的兴起,诗人们在作诗时注意四声的区别,讲究平仄的间隔运用。这种对声律美的追求又与晋宋以来普遍讲究对偶的风尚相结合,形成了永明新体诗。到了南朝梁、陈二代,新体诗逐渐朝严整的格律化道路发展,为唐代五言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自建安时代曹丕开始写《燕歌行》以后,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一直等到南朝宋代鲍照的出现,才创作并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歌行体。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的形式,为五、七言绝句体抒情小诗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凡此种种,对唐诗题材、意境的开拓,形式的齐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唐代诗歌不管是比较自由的五、七言古诗或乐府歌行,抑或格律严整的五、七言律诗,还是短小的五、七言绝句,都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唐代诗人在观察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运用声律、修辞、对仗的能力,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也都达到了高度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离不开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学习和借鉴的。即如对南朝以来形式主义诗风,唐代诗人在批判其绮靡浮艳的同时,也能注意从中学习、借鉴一些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将如何由汉代荒凉的诗歌园地直接开放出唐代诗苑的绚丽奇葩,这是很难设想的。

综上所述,唐诗作为我国诗歌史上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它的繁荣,是受唐代特定历史条件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所制约的,是对前代诗歌的合理继承,推陈出新结出的丰硕果实。解释唐

诗繁荣的原因，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因素、条件的作用。因为任何单一的因素、条件都无法起决定作用。如果能从外因和內因相结合的辩证关系来探讨这个问题，文学史上一些既片面又含有某些合理因素的观点，如科举取士说，统治阶级提倡说等等，是不难澄清的。

二

纵观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公元618—906年），社会经济条件、政治现实的变化和诗歌自身的演变过程，在唐诗的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学史上对唐诗的分期说法不一。明代高棅定唐诗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诗品汇》），基本上接近唐诗发展实际情况。我们就按初、盛、中、晚四期说，作一简要说明。

初唐时期（公元618—712年）约一百年间，诗人不少，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在三百人以上。这批诗人中创作倾向不一，成就高下不等。唐代初期，围绕唐太宗宫廷的诗人，或是开国时的风云人物，或是由陈、隋入唐的老臣。他们生活在上层社会狭小的天地之中，又受南朝诗歌多方面的影响，很自然地把南朝诗歌崇尚辞藻对偶的诗风接受过来，贯彻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如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李义府，长孙无忌，上官仪等，虽或有辞意清新之作，然作品总的倾向是典丽精工，绮错婉媚，见出齐梁余风的影响。也有少量作品，艳靡轻浮，以赏乐的态度描写了贵族的腐朽生活，代表着诗坛一种不好的倾向。和这两种倾向分道异轍的，则有宫廷诗人的魏征和辞官归隐的王绩。魏征的《述怀》

诗以刚健的笔力写戎马生活的艰辛，感恩报主的豪气，气格高古，不同凡响。王绩则以清淡自然的语言描写农村生活和归隐情志。力求扭转齐梁余风的，是七世纪下半期四位才华不凡、号称“初唐四杰”的诗人，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是唐代开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除卢照邻外，都比较年轻，向往革新诗风；他们来自下层，远离宫廷，官位卑微，比较接近现实社会。其诗歌创作特色表现为题材的开拓和思想意义的提高。下层社会的生活，从军出塞的抱负，登临送别的感慨，个人幽愤的倾诉，都表现出诗人各自的情性和胆识，表现出正处在改革进程中的崭新的时代精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人王勃在送别的诗题下别开生面，唱出了境界开阔的送别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杨炯向往出塞立功，唱出了积极进取、气势不凡的《从军行》；卢照邻在描写长安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时，大胆唱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显示出颠狂中的思索和战栗（《长安古意》）；骆宾王的五言律诗、绝句如《在狱咏蝉》、《于易水送人》等，声律与风骨兼备，颇见功力。“四杰”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初步克服了齐梁余风，推动了五言律诗向前发展。稍后于他们从事诗歌创作的还有一批围绕在武后宫廷的诗人。除了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外，还有在诗坛上齐名，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和宋之问等宫廷文学侍臣，为了适应宫廷享乐需要，都在致力于写作奉和应制、扈从侍宴的诗歌。不过，由于他们在诗歌的形式上下了功夫，斟酌音韵，技巧更臻成熟，使得五、七言律诗先后成熟、定型。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不能加以抹杀。初唐时代最终完成诗歌革新历史使命的诗人，是陈子昂。他是一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探索家。他对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认识，对比诗经风雅比兴

和汉魏风骨的传统，对诗歌革新的迫切感有了自觉的认识。因此，他能够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标榜“汉魏风骨”，强调兴寄，以求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感遇诗》三十八首，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这组诗内容复杂，风格不一。它以清峻质朴为主要特色，彻底扫荡了齐梁余风在诗坛上的影响，为盛唐诗歌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明人胡震亨称陈子昂为后世诗坛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唐音癸签》），给予了很高评价。从陈子昂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来看，这个评价不算过分。

盛唐时期始自玄宗初年，止于代宗永泰元年，即公元七一二年至七六五年。一方面这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盛的时代，乐观向上、浪漫豪放的情绪成为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主流。同时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社会阴暗面逐渐明朗化，以致爆发了动摇唐帝国的安史之乱。许多正直的、有才华的诗人，或因仕途失意，或因政治上遭到打击，眼光慢慢由时代的光明面转向时代的阴暗面。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唐诗从思想到艺术的全面发展，迎来了被后人无限向往的“诗必盛唐”的时代。这一时期，依据诗人们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的特点，又可分为田园和边塞两大诗派。当然，这种划分只有相对意义，同时也不能包括全部盛唐诗人。

盛唐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诗人们提供了优游山林的和平环境和物质基础；儒、道、释思想的自由传播和信仰，使归隐田园山林变成时代风尚，一些人乘此走由隐致仕的“终南捷径”；又由于开元末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以来，政治日渐黑暗，社会衰落的征兆开始暴露出来，一些原来怀抱经国济世、建立功业的诗人，因遭到打击，进身无路，对现实政治失去了热情，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寄身田园山林。

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和陶冶。同时又有前代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的传统影响，田园山水便成为一些诗人喜欢吟咏的题材。田园诗派的代表是王维、孟浩然。

和盛唐时代许多诗人一样，王维早年也曾向往进取，建立功业。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几经挫折，才逐渐皈依佛教，寄身山林的。他早年的诗多方面地反映了盛唐时代的生活风貌和时代精神。特别是他曾出使河西，饱览塞上风光和各民族的习俗民情，写了不少富有特色的边塞风情诗。如《使至塞上》、《凉州郊外游望》等篇，为祖国西北边塞的一角——陇右河西景色、风情，留下千古传诵的名篇。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是他归隐生活和审美趣味相结合的产物。他由衷地热爱田园山水宁静、和谐的美，善于从平凡的景物中感受到山水景物在宁静中蕴含着丰饶的生意。《鸟鸣涧》、

《山中》、《书事》等小诗，是一位对客观景物具有灵心慧眼的诗人的独特创造。当然，王维也有一些直接宣扬佛家消极出世思想和士大夫闲适情调的诗，另当别论。王维诗在艺术上的高度造诣是诗情画意与音乐旋律的结合。他多才多艺，精通音乐，擅长绘画、书法，在创作中充分发挥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韵悠扬的美妙境界。他描绘边塞风光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摄取两种不一定同时出现的景色组成画面，又以“圆”“直”两字状之，将塞上广漠的景象，神韵生动地展示出来，深得绘画功力之助。他的五、七言绝句，情味隽永，旋律优美，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在当时就是广布人口的名篇。除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裴迪等人的田园诗，也各有特色。清人沈德潜评孟诗“闲远”、王诗“清腴”、储诗“朴素”，都是祖述陶渊明，而能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

中国古典诗歌的田园山水诗自晋、宋陶渊明、谢灵运开创以

来，到盛唐田园诗派的形成，无论对田园山水的审美能力的提高，还是表现田园山水的艺术经验的积累，都是无法抹杀的客观存在。如果放眼世界艺术史，不难看到，当西欧各国诗画把自然风光作为描写对象时，已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事了。我们应为祖国丰富多采、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产而自豪！

开元天宝时期的边塞诗，从另一方面展示出富有特色的社会生活风貌。边塞诗的产生，自然和唐代开国以来对外战争有密切关系。从太宗到玄宗，对外用兵频繁。这些战争的性质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既有出于解除外患、保卫边疆的需要，也有扩张疆土、穷兵黩武的野心。而这些战争在盛唐时期屡屡取得胜利，不但大大地提高了唐王朝的声威，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边塞便成为吸引人们建立功业的广阔天地。同时，边塞诗派的诗人多抱有强烈的功名心，但在朝廷中却找不到出路，便纷纷奔向边塞寻找报国封侯的机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第三十五）。“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这是初唐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他们从军出塞，远别家园，在长期边塞生活中，体验了边塞军中的生活，饱览了边塞风光，呼吸了盛唐对外战争胜利的空气，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它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把这些感受反映到诗中，一时蔚然成风，形成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高适的《燕歌行》在颂扬广大士卒浴血奋战不为名利的爱国精神的同时，将他们悲壮感人的牺牲和将军幕中美人歌舞的腐败、麻木的情景，作了鲜明对比，有力地揭露了边塞军中的矛盾。李颀的《古从军行》：“野云万里无城廓，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

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在描绘出边塞荒寒景象的同时，对长期承受战争负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苦难抒发出感慨和同情。岑参的边塞诗描绘了军中士气高扬，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饶有特色的风光物候、风土人情、音乐舞蹈，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戏问花门酒家翁》、《题金城临河驿楼》、《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等。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等作品，多方面地为盛唐时代河西、西域边塞军中生活、风土物候留下精妙传神的写照。由于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不尽相同，诗人的审美趣味、创作个性各有特色，边塞诗的风格也是各有特色，互相映照的。高适诗苍劲雄浑，岑参诗雄奇奔放。其余诗人，或幽怨而不哀伤，或悲壮而深沉，或壮阔而明丽，各逞其美，相得益彰。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至今不但使读者眼界为之开阔，同时也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

盛唐诗歌最杰出的代表，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兼擅王、孟、高、岑各家之长，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李白所处的时代，主要在安史之乱以前。他怀抱从政的理想而又怀才不遇，无论求仙访道、隐居漫游、饮酒狂放，都消蚀不了他心中报国的热情。安史之乱起，他接受了永王璘的邀请，入永王幕府，准备为荡平叛乱、统一祖国而贡献余生。李白的诗歌以抒情见长，兼有写实的作品。追求理想、光明、自由、正义；抨击庸俗、虚伪、黑暗、丑恶；蔑视权贵，亲近平民，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它们或贯穿于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直接描写，或借助历史故事、远古的神话传说作或明或隐的比喻，或借梦境抒其情，或借山水寄其意。《古风》五十九首、《鸟栖曲》、《行路难》、《将进酒》、《北风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等代表作，无不体现李

白创作的主要精神。李白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并发展了屈原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推崇汉魏风骨，潜心学习乐府民歌，在批判建安以来绮丽诗风的同时，认真借鉴两晋南北朝以来一些有成就的诗人如鲍照、谢朓、庾信等人的艺术经验，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推陈出新，创造出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形式的运用上，他擅长运用七言歌行，抒发澎湃的感情，显示出纵横不羁的气势。他虽从小读百家书，对诗、赋等各种体裁都有过训练，但却不愿受律诗格律的约束。从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律体作品来看，他往往突破格律的规矩，如《宿巫山下》颔联：“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送友人》颔联：“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平仄合律而未对偶，见出散文句式的特点。在近体诗的领域中，李白特别擅长七言绝句，作品飘逸清丽，情韵悠扬，在盛唐诗坛上，只有王昌龄的七绝堪与比肩。李白诗歌富有创造激情，后世很难仿效的独特风格，在当时诗坛上高标独立，充分显示出盛唐诗歌的高度成就。

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盛唐时代所哺育，吮吸着时代乳汁成长起来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只不过他比李白小十一岁，既有开元全盛日的珍贵回忆，也目睹了天宝年间社会政治现实的转折变化。待到安史之乱爆发，他在巨大的社会动乱中，颠沛流离，饥寒冻馁，沦落到生活的底层。十几年中，饱经忧患，对内乱外患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始终如一地予以关注。唐诗发展到杜甫，已由前期乐观明朗的基调变为沉痛压抑的悲歌。杜甫许多不朽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春望》、《三吏》、《三别》、《北征》、《羌村》、《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对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的社会现实，作出了

全面、深刻的反映，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时代生活画卷，毫无愧色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被人们誉为“诗史”。举凡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贵族豪门的穷奢极欲，政治现实的黑暗腐朽，各级官吏的残暴贪婪，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都连同它们各自的生活环境特色真实地展示出来，而贯穿这些题材的思想红线，则是诗人一生至老不衰的忧国忧民的崇高感情。不必讳言，杜甫诗中时常流露出执着的忠君思想，这是时代使然，应该加以具体分析。同杜甫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博大胸襟相比，这一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其光辉成就。杜甫的诗歌继承了诗、骚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以赤诚的心去感受时代脉搏，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有关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重大题材，结合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精湛的文艺修养，在如实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人，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力量。他的诗具有高度概括、凝练的功力，笔调客观谨严，抒情回荡曲折、含蓄蕴藉，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如《三吏》、《三别》、《秋兴》、《登高》等诗，最能显示这种风格特色。在诗歌形式上，杜甫成功地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体裁，并给予创造性的发展。长于叙事的五言古诗，他往往用以反映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质朴平实，精光内含；七言古诗长于抒发波澜起伏的感情，他喜欢用以倾诉自己那沉郁的哀痛和激愤，在这两种形式中，他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五、七言律诗长于抒发凝聚、曲折的情思，他往往用以抒写感伤身世、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特别是他的七律，格律严整，富艳精工，造诣高超，成为后人学习、仿效的典范。

三

杜甫以后，唐诗进入第三个时期——中唐。